



人间真情

我的父亲

李甫君 李祥君(漯河市)

父亲目不识丁，是再普通不过的山区农民。然而，他的善良、本真、勤劳、节俭的品格，一直在昭示着我们，激励着我们，感动着我们。

一九一九年农历八月十六，父亲李保出生在大行山深处的汲县(现卫辉市)狮豹头乡大猴梯行政村小猴梯自然村。

这里山高沟深，地势险峻，环境恶劣。人们出门就爬坡，全靠肩挑背扛；人多地少，土地贫瘠；水源奇缺，十年九旱。“糠菜半年粮”，可谓是这里的真实生活写照。

父亲出身贫寒，从小吃糠咽菜，是苦水里泡大的，一张炕头一条席，一床被子全家盖，一件衣服轮换穿，一年到头不添衣。

父亲10岁以前夏天没有穿过鞋子，15岁之前夏天没有穿过褂子，成年前没穿过袜子。冬天穿单衣上山干活，风从裤腿里灌入，从领口钻出，手脚被冻得裂出道道血口。

父亲懂事特别早，从小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好习惯。他6岁上山放牛，8岁上山割草，10岁用筐篓到牛泉(香泉河一处泉眼)挑水，十四五岁赶会卖白草、干草、荆条，十六七岁学会了使用犁、耩、锄、耙等各种农具。

父亲小时候就上山抓蝎子，创远志(一种中药)、打野酸枣、磨山韭菜，到集市上卖钱。父亲赶会卖白草、干草、荆条时，忍饥挨饿从不往外边买东西吃，把钱原封不动地上交爷爷。

父亲有10个子女，7子3女。夫妻俩应对全家人的吃喝，现在来看简直不可想象。

虽然国家给山区群众统一发放返销粮，但是由于没钱购买，整本整本的根本都作废了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为了养家糊口，父

亲在会上集小麦、玉米、谷子等粮食，杂麸皮、粗粮、高粱等物，一年四季很少吃精细粮。

春天，父亲到山上挖野菜、捋树叶给孩子们充饥。青黄不接之季，父亲用铁丝从石缝里掏老柿叶、老桐叶、老枫叶等给孩子们下锅。老树叶一嚼一口渣，食用后经常出现干结便秘现象。

十二口之家，家里地里都有一大堆活儿等着父亲干，白天干不完，夜里接着干。

父亲天天起五更搭黄昏，没日没夜地劳作，睡眠很少。父亲不是不想睡，而是不能睡。

父亲每日五更天就起床到牛泉挑水，小猴梯到牛泉一来一回三里地，别人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时候，父亲已经挑了两三担水了。

冬春季节，父亲经常往返30多里山路，去太行山深处黑峪沟、猴猴沟的桃林里割荆条。白天出工劳动，晚上挑灯夜战编荆条，农闲到陈召煤矿卖荆条。

父亲到风景区凿王坟卖柿子，单程有30多里，他挑着160斤重的担子，半夜就得动身，摸黑才能回家，常常是披星戴月，两头见星星。

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父亲为了照顾子女，他舍不得吃喝，结果不慎患了严重的浮肿病，全身都是道道裂口，黄水直往外渗。

在当时的汲县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期间，由于家庭条件太差，父亲每天只能靠吃炒麸子来补充营养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太行山区有多种传染病，我们兄弟姊妹先后有7人感染。当时，母亲正在医院护理病号，父亲在医院和家里来回穿梭，第一时间把得了传染病的孩子送往医院。

父亲很仔细，吃红薯从来不吐红薯

皮，米粒掉在桌上赶快捡起填在口中。

1969年年底，在修建水南坡水库时，父亲因劳动积极，被大猴梯大队奖励了一双棉鞋。他视若珍宝，缝了又缝，补了又补，穿了整整10年。

父亲有个“百宝箱”，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还真不少，废旧驴龙头、皮绳、单线绳、牛套、驴套，废旧钢钎、压杠、锤子、挖耳勺，废旧破布、鞋子等装得满满的。

1973年3月，父亲在山上当扩路员，每月挣30个工分，还可以领取3元的补助。

父亲将每月的工资包好放在梁头上。两年之后，我家请木匠打家具，需要支付工钱，父亲从梁上取下一个布包，只见布包里整整齐齐包着他的工资，一数整整90元，顶了大用。

后来，我家从山上搬到了牧野区白露村，麦收时节，父亲在村口看见有麦穗丢在路上、麦地里，十分心疼。这时，在马路旁，在麦地里，有一位身背蛇皮袋，佝偻着腰，在太阳底下弯腰拾麦穗的老人，他就是我们的父亲。

有时他还会到土路上，用簸箕、笤帚扫麦粒。

每年麦天，父亲都用他捡来的小麦换成西瓜、豆腐、蔬菜等，改善伙食。

父亲尽管自己生活不容易，但看不得别人受苦，他总是想方设法帮一把，周济比自己更困难的人，捐款捐物，还出力。

1975年秋天，父亲到30里开外的县城卖扁豆，挑了一大挑扁豆角，足足有160斤。白天，摆地摊；夜里，露宿街头；渴了，到饭馆讨点水喝；饿了，啃两口干粮。

3天后，父亲将卖扁豆角的钱用别针别在贴身口袋里，开始往回返。

父亲在东陈吕汽车站刚下车，发现

一辆拉煤的平车，一对母女为了避让来往车辆，不慎翻在路沟里。父亲二话没说，赶忙协助母女俩推车。这对母女根本拿不出钱来，而且一天多没有吃饭了，母女俩是延津县的，到家还有60多里地。父亲不仅帮母女俩修好了平车，还上饭馆管了母女俩一顿饭，临别还给了这对母女1元钱。

父亲回到家，翻开口袋一数，卖豆角的钱所剩无几了。

1991年5月6日上午，父亲去商店买东西时，在路边捡到了一个黑色皮夹，内有一大沓子钞票，还有合同、存折、证明等。父亲在原地将两个多小时，终于等来了失主。原来，失主是山西大同人，专程来新乡洽谈业务，不慎把手提皮夹丢在了路旁。

望着失而复得的钱物，失主忙从皮夹内取出300元作为酬劳，硬要塞给父亲，结果被父亲婉言谢绝。

……

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一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他凭借一身力气，在土地中刨食供养10个子女吃喝，抚养他们长大成人。

二〇〇三年农历二月十六日中午，父亲走完了他的一生。

父亲，我们永远怀念您！



榴花



艺苑短波

河南杂文学会召开李辉报告文学《大山脊梁》研讨会



本报讯 日前，河南杂文学会在新乡南太行召开2024年年会暨李辉报告文学《大山脊梁》研讨会，来自省内近30名杂文作家畅所欲言，围绕这部报告文学进行研讨，分享了各自的读后感想(如图)。

在2024年年会暨《大山脊梁》研讨会上，河南杂文学会对前半年学会工作进行总结，在汇聚各地市杂文学会年度计划的基础上，制定了省杂文学会2024年度工作计划。接着近30名杂文作家纷纷发言，对报告文学《大山脊梁》给予很高的评价，普遍认为该作品叙述格局

宏大，塑造的“最美奋斗者”裴春亮生动鲜活有立体感，艺术特点呈现上下左右的丰富联想，具有新闻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。整部叙述不只局限于裴寨村，每个章节都与国家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联系在一起，以一峰之奇秀，见群山之雄迈，是用一把刻刀雕刻出的历史长卷，是一部有深度、有厚度、有温度的好作品。

报告文学《大山脊梁》是新乡先进人物报告文学系列丛书的其中一部，系列丛书共分7册，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。(辛讯)



诗林折枝

乌夜啼·夕阳

董建芳(河北省邯郸市)

海泛流光曲，波弹万里行云。
远山浮水重重影，连岛宿新痕。

放眼夕阳斜照，收心欲念杂陈。
晚风拂过情如醉，恰似饮甘醇。



小小说

壮举

侯发山(郑州市)

黄永楠回到老家后，没有进家门，而是直奔黄家祠堂。这是他们黄家祖上的规矩，在外的游子回家后，要先来到祠堂，在祖宗牌位前给老祖宗“述职”，简述自己在外的是非功过。有功者，会受到表彰，上红榜；有过者，将要受到惩罚，除了在黑榜上亮相，还要罚跪。“述职”的地方是祠堂的“三跪堂”，中间是列祖列宗的牌位，两边有一副对联，上联：跪天跪地跪祖先；下联：子孙有志莫膝软。

父亲得知黄永楠这天要回来，早早等候在“三跪堂”。

黄永楠走进“三跪堂”，目不斜视，径直走到祖先的牌位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埋着头，半天一动不动。

父亲心中一惊，心说坏菜了，这小子在外没干好事。可是，他平时在单位表现也不孬啊，请客送礼的事没干过，也没有收取过他人的贿赂，还被当地纪委监委树为廉政标兵。他平时省吃俭用，资助了两名大学生。地震、洪灾等灾难来临时，他也没少捐款……这些情况他之前在“述职”的时候就讲过了。“爸，我回来了。”

这不废话吗？黄永楠吞吞吐吐，欲言又止，更加剧了父亲心中的猜测。老人家深吸一口气，平静了一下心情，说：“孩子，你到底惹了啥事？”

黄永楠知道，在祠堂里，什么事都不能瞒，便如实告知：“爸，今天我给人下跪了。”

父亲说：“不是被人逼的吧？如今是太平盛世，不会有这事。”

“没有人逼，是我自愿的。”

“自愿的？你的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”父亲上前要踢黄永楠。

“爸，您听我解释。”

“我不想听！”父亲气呼呼地质问：“我问你，你爷爷的腿当年是怎么瘸的？”

“爸，我知道。”若不是在祠堂，黄永楠要回怼父亲一句：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

1943年，日寇侵略到老家这个地方，那时，爷爷还是十几岁的孩子，看到敌人杀人放火，他恨得抱着敌人啃两口。敌人让爷爷带路，爷爷不答应。敌人就让爷爷跪下，爷爷不跪，昂着头，很是倔强。敌人气坏了，拿起枪托抡到爷爷的一条腿上，从此落下了终生残疾。直到死前，爷爷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的。

父亲继续质问黄永楠：“我问你，我为啥当年从单位辞职？”

“爸，这件事我也知道。”都是老黄



名家访谈

“小说的魅力让我欲罢不能”(上)

——赵文辉访谈录

李勇

赵文辉的小说我以前看得不多，后来完全是因为好奇他的经历，开始了解他的创作。之后，我们虽无深交，但毕竟渐渐熟络，而读一个熟人之作，和读一个陌生人之作，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。由此“读熟人之作”的感觉，我更进一步地对其人其事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他一直谦称自己为“基层作家”，这话里有一种“沉重”的东西，但这“沉重”于创作而言却是一份难得的财富。时至今日，赵文辉一边勤勤恳恳地经营着他的豫北书香大酒店，一边将这袍厨间的人世冷暖化为涓涓文字，倾吐着他对故土、对生活、对人生的情愫。每个文学之路上的跋涉者，都有一份初心和守望。祝福赵文辉，以及像他这样历生活之艰辛仍初心不改的写作者。

李勇：谢谢文辉兄接受访谈！看相关资料，你的第一本小说集名字叫《布衣心情》。你的老家具体在哪里？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喜欢文学？

赵文辉：我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布衣心情》，1998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，2000年有幸荣获“第一届河南省文学奖——青年作家优秀作品奖”。入围消息在《大河报》公示，是当时在卫辉市顿河乡政府上班的安庆打电话告诉我的。

我的老家叫南姚固村，隶属于辉县市，这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旅游城市，南太行把它最锦绣的一段留给了我们，八里沟、宝泉和郭亮挂壁公路，一说大家都知道。南姚固村的来历县志里有记载，是元朝姚枢退隐时所建，儒学名村之一，文脉流长，读书习字之风甚热。目前，这里出了中国作协会员1名，省作协会员8名，中国书协会员1名，还成立了全省唯一的村级作协。

我最早喜欢文学应该是受武侠小说的影响，初中时期喜欢读梁羽生和金庸的那些小说。当时，我还和班里一个叫李连发的同学合写了一部武侠小说《燕山双侠》，其实我俩连燕山是哪里的都不知道，全是靠想像胡编的。另外，我就是受广播剧的影响，我对路遥的《人生》听得如痴如醉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一直在寻找生活里的刘巧珍，从不敢以高加林自拟，只想做个幸福的马栓。

上了中专以后，我接触到一些文学书籍和文学杂志，才开始写作投稿，走上了这条路。

李勇：你发表第一篇小说是在哪一年？具体是什么情形？

赵文辉：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叫《苏门山散记》，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

像散文，发表在1989年7月7日的《新乡晚报》副刊。那时我已参加工作，在一个叫“赵固轧花厂”的乡棉站当棉检员，孤独和失意促使我向文学靠拢得更近，看书，写作，记笔记，买邮票信封，忍受着棉站出纳的一张臭脸去会计室要方格稿纸，星期天骑车去60里外的县城报刊亭买杂志，这就是八小时之外的生活。一开始，我写的都是报纸副刊文，那种略微带点虚构成分的生活随笔，一直到1993年，发表在《短篇小说》第3期的小小说《小玉》，被《小说选刊》第6期转载，我才真正有了文体意识，确定了自己的文学方向：写小说。那一年，我的小说《小玉》和短篇小说《挡车工小丽》双双获《短篇小说》年度奖。

因此，很多时候，我把《小玉》当成自己的处女作。

李勇：我不了解你早年读书的情况，你生于1969年，20世纪80年代文学火热的年代应该是有经验和记忆的。你走上文学道路，是不是跟这种经验和记忆也有关？

赵文辉：说到这个问题真是脸红。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农村上的，除了语文课本，除了武侠小说，一本文学作品都没看过。我上的中专叫新乡供销学校，前身是新乡地区财贸干校，给供销社培养实用人才的，根本没有那种想象中的文学氛围。我上课看《小说月报》，老师逮住就把书没收了，投稿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了，错过了作家们经常提到的把信封剪个角就完事的时代。我当时看的最多的就是文学杂志，喜欢哪篇就多看几遍开始仿写，写完就按杂志上的地址往外投稿。“泥牛入海”这个词在我身上应验了，发表不出来挺着急，又投师无门，只好上文学函授：《飞天》《三月三》《短篇小说》《百花园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《女子文学》，工资花这上面不少。不过当时的编辑非常负责任，一篇小小说，能给你写几页指导意见，比原稿还长。

李勇：我看你的自述，2000年的时候你参加的河南省文学院研修班，那时候三十出头，应该是很年轻了。参加这个研修班，当时是需要什么条件？那时是不是很受鼓舞，所以接下来几年才决意做一个比较纯粹的写作者？

赵文辉：我参加河南省文学院高研班是由市作协推荐的，发表过一定作品、年轻化、热情高，好像就这些条件吧，新乡学员最多，一共6个，冯杰、安庆、尚新娇、王春花、王保友和我。那个时候，南丁、张宇、孙荪、李佩甫、墨白等名家悉心授课，对学员爱护有加。我们

之前被老师们的作品震撼过，崇拜得要命，这回“见到下蛋的鸡了”，自然激动得不得了。埋头听课之余，我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写出《学习微笑》《活鬼》《败节草》这样的小说，单位、家里的系统统统抛在了脑后，皈依文学之心日盛。

当时我是辉县市最大一家超市的副总，学习结束后觉得这份工有碍创作，干脆写了辞职报告，去《新乡广播电视报》当了一名副刊编辑，后来《平原晚报》创立，又去那里接着编副刊。新乡作协编内刊《牧野》。尚新娇在我俩之前就把辉县市房管局的正式工作辞了，来《新乡日报·晨报》当编辑。其实做到我们所有人头里的是尉然。这家伙入学前就下岗了，还离了婚，花500元在县城租了一间房，过着“专业写作”的独居生活。读书期间，他已经写出了让他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的小说《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》。

李勇：看你自述里，你做了几年纯粹的写作者之后就回到老本行了。是不是因为尝尽了写作的甘苦？甘肯定不如苦多，不然也不会重归老本行了。

赵文辉：李教授，不是回归老本行，是丢下创作开始开饭店，用这种方式来养家糊口。一门心思把小说写好。为了减少与外界联系，我把手机号销掉开通了个小灵通，很少告诉别人。我姐的面包车让交警扣了联系不上这个在报社上班的兄弟，她气得把电话都摔了。就这样不管不顾昏天黑地地写了几年，我的中短篇小说“攻克”了很多期刊。当时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微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，经济非常拮据，一次水果都没买过，那时，我和安庆到处找房租低的房子，大热天住在顶楼，没有空调经常夹着席子去公园睡觉。尉然来访，他也跟我们一块夹着席子去路边公园凉快，到后半夜才返回出租房。

2006年年底，我开始向生活妥协，创办了一家婚礼主题酒店，用的是我的第三本小说集的名字——豫北乡下。

李勇：一边写作，一边当酒店经理；或者说一边当酒店经理，一边写作。一个人同时做两件事，确实不容易，更何况作家这个活儿是需要“沉潜”的，专心致志都不一定能做好。但生存，又是我们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，所谓“生命第一要义”。我看你自传里说了两次决意离开俗务，投身读书创作，这很不容易啊！文学在这个年代又带不来多少名利。所以我觉得，你的离开和回归，从

根本上说应该还是对文学有一种绕不开的，或者说挥之不去的情结吧？

赵文辉：对小说真的是割舍不下，可是酒店的节奏陷进去就不好往外拔了，文学一下子和我成了陌路。整整8年，就看了几本书，写的小说更是屈指可数。因为开酒店打开了自己，跟很多人建立了往来关系，红白喜事都要参加。每天一睁眼都有一大堆杂事在等着，永远都处理不完，既没时间思考，也没时间厌倦。搞得我越来越心神不定，这种密不透风的日子要把我毁了。梭罗在他的《瓦尔登湖》里写道：“我们的生命在琐事中浪费掉。”这话一点都不假。

作为一个生意人，对小说不死心的家伙，我的真实感受是：挣钱是上瘾的，也是痛苦的，因为手中的笔迟迟不能开始。稠密的生活固然能带来丰富的创作素材，但是对创作也是一种阻挡和伤害。正如卡尔维诺所说：“谁想看清尘世，就应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。”2016年下半年，我痛下决心，把酒店股份让给一部分员工，一头扎进了家乡的深山。第二年，酒店彻底转让给了一个同行，做得非常决绝。

李勇：有人说你开酒店和写作相得益彰，写作和生意能互相成就。真实情形是不是这样？

赵文辉：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。开酒店那几年，生意好得一塌糊涂，我把赚来的钱全部买了门面房。这步棋走对了，每年的房租在豫北小县城足够一家人生活，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(我的确切身份是“城关供销社下岗职工”)，再不用担心吃喝问题了。这对创作当然有益。另外在开店的过程中，我特别注意发现、收集原创性细节，始终相信一个好细节可以支撑一篇小说的说法。好素材总是不期而遇，增加了“餐饮人系列”小说的生动性和好看度。这是有益的一面。

2018年，我再次出山，开了一家新店，就是现在这个豫北书香大酒店，行情三年，算是没有死掉，元气可是大伤。为了打翻身仗，我一直守在店里，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，创作又间断了。这样停停写写，写写停停，对创作是有损害的。写小说是门手艺活儿，停业的时间长了就会生手，每次回归，都需要很长时间恢复。作家不是一只水笼头，随时拧开就能哗哗出水。

(原载《南腔北调》2024年第6期。作者李勇单位：河南文艺评论基地(郑州大学)、郑州大学文学院。)